泥土的重生与时代的潮汐
叶梅《能不忆江南》：

她更记录了那些阵痛、犹豫、奋斗与欢笑的过程。

■程士庆

白居易在晚年写下“能不忆江南”的诗句后，由烟雨、园林、离愁组成的“江南意象”便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一种柔软乡愁。在叶梅的新作《能不忆江南》中，江南不仅是诗意的栖居地，也充满了现实的张力。这是一部近18万字的散文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游记或怀乡散文，而是一部关于“变迁”的厚重档案。作者将目光投向了浙江，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区，以“千万工程”20周年为经，以安吉、嘉兴、绍兴、台州、舟山等地的地理空间为纬，绘制了一幅从泥土到云端、从山川到海洋的当代《清明上河图》。在这里，江南不再仅仅是用来“回忆”的旧梦，而是正在发生的、充满生机与阵痛、科技与人文交响的“未来预演”。

全书的叙事起点选在了安吉，这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也是解读当代江南变革的密钥。第一章《收获时节的安吉》呈现出一种冷峻与温情交织的质感。作者没有回避历史的伤痕，直面那段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炸山开矿、尘土蔽日的日子。书中有个细节极具震撼力。在余村，废弃的矿渣被重新铺设成时尚的地面，采矿工具变成了艺术装置。这种物质形态的转化，隐喻着发展逻辑的根本变化。

叶梅笔下的安吉，不是一个静止的桃花源，而是一个充满博弈的场域。她写潘春林这样的普通村民，写他们在“卖石头”还是“卖风景”之间的犹疑与决断。最动人的篇章莫过于“余村夜话”。在千年银杏树下，返乡的年轻人与留守的长辈围坐，讨论的不再是收成，而是“如何让竹林长出科技”。这里的“绿”，不再是文人笔下的苍翠，而是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资产与生活方式。

为了深化这一生态主题，作者在书中开辟了关于“天目山大树王国”的章节。余村的故事是关于“修复”，天目山的故事则是关于“敬畏”。叶梅详细描绘了那些历经数百年风霜的“霜木”与“翔凤林”，并引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的记载，将时间的维度瞬间拉长。她写道：“在这片靠近东海的山域里，树木不仅是植物，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记忆。”书中提到了古人“交树交印”的制度，官员离任时需核查古树数量。这种古代的“离任审计”与今天安吉护林员手中的数字化监测手段形成了奇妙的互文。

当现代护林员告诉作者“古树会咳嗽、病树会打颤”，并开始使用地温传感器监测根系震动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的科学技术完成了接驳，让那片曾经受伤的山川得以重新呼吸，也让依附于土地的人们找到了新的尊严。作者通过对天目山大树的礼赞，将生态保护的意义提升到了文明赓续的高度。守护大树，就是守护大地的记忆。

在叶梅笔下，嘉兴湘家荡的稻田呈现出一种科幻般的现实主义色彩。作者不厌其烦地记录那些精准的数据，例如北斗导航控制下的拖拉机误差不超过2厘米，物联网监测站实时上传土壤墒情，无人机在低空喷洒生物农药。这些工业与科技的词汇切入柔软的泥土并未显得突兀，反而构建了一种新的美学——“数字田园”。

更值得注意的是，叶梅敏锐地捕捉到了乡村在“富起来”之后的“美学觉醒”。描写三星村时，她花费了大量笔墨去刻画那个由老砖窑改造而成的文保纪念馆。昔日冒着黑烟的烟囱，如今长出了桃花；原本堆满砖瓦的场地，变成了一条铺满花瓣的引人驻足的小道。作者惊叹于那个“形似艺术馆”的家宴中心，高大的门厅、落地玻璃窗、墙上挂着的农民画，让人恍若置身于中国美术学院的校园。

这种细节的捕捉至关重要。它揭示了“千万工程”的深层肌理，乡村振兴不仅是产值的增加，更是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的重建。当农民开始在墙上作画，当公共建筑开始追求设计灵感，这意味着乡村不再是城市的附庸，而是一个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文化空间。书中提到的“新农人”小郭，那个在温室大棚里像操作精密仪器一样控制遮阳帘的退伍军人，正是这种新乡土的代言人。他们留下来，是因为这里既有中关村般的科技挑战，又有桃花源般的艺术生活。

江南之所以为江南，在于其深厚的文脉。然而，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安放传统的灵魂，是本书探讨的另一个深层命题。第三章《梦里犹呼起看山》提供了一种充满张力的观察视角。

乌镇既有木心笔下的“从前慢”，又有世界互联网大会的“5G快”，摇橹船的桨声与数据中心的嗡鸣声在此共振。江南的文化是一种活着的精神。叶梅写绍兴塔山小学的唐泽民夫妇带着女儿远赴四川马边支教的故事，看似是在写扶贫，实则是在写江南士大夫精神的现代回响，写一种“兼济天下”的责任感。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到蔡元培的教育救国，再到今天援川教师的默默奉献，这种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善意，正通过具体的个人向更广阔的中国腹地辐射。

《明月共潮生》是全书气象最为宏大的一部分，它标志着江南叙事从小桥流水向波澜壮阔突围。叶梅没有回避现代治理中的琐碎与艰难。在描写舟山群岛时，她将笔触深入到了“厕所革命”和海洋垃圾治理的细枝末节。书中提到了岱山县涂口村曾经的“70多个旱厕、露天粪缸”，以及整治过程中村干部如何挨家挨户做工作，最终被干净环保的移动公厕取而代之。这些看似不“文学”的细节，恰恰构成了本书最扎实的现实根基。作者详细描写了“蓝色循环”治理模式，记录了渔民如何通过数字化手段回收海洋塑料垃圾。这种对“藏污纳垢”之处的直视与改变，比单纯的歌颂海景更有力量。它证明了江南的现代化是落实到每一个排污管网、每一个垃圾桶的精细化治理。

当然，江海不仅有治理的理性，更有情感的波涛。书中关于台胞重返大陈岛的描写，堪称全书情感浓度最高的段落。那位年过五旬的女子踏上岛屿时嘶哑的喊声“回家喽”令人印象深刻。叶梅在这里处理得非常克制而深情，“她或许是在向先辈禀报，也或许是在向后人呼唤”。这一刻的大陈岛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连接海峡两岸的血脉纽带。

义乌商城的早晨、中欧班列的汽笛展示了江南开放的另一面。这里的江南敢于向海洋要发展，敢于在全球贸易的版图中占据核心位置。书的结尾，作者描写了钱塘江的大潮。那“一线潮”由远及近，最终化为雷霆万钧的轰鸣。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意象既是浙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精神的写照，也是时代洪流的隐喻。

叶梅以一种记者的敏锐和作家的悲悯，深入到了这场变革的肌理之中。她不仅记录了美丽乡村的风景、增长的数据等结果，更记录了那些阵痛、犹豫、奋斗与欢笑的过程。江南正在以一种生态更优美、经济更发达、文化更自信、社会更和谐的全新姿态，屹立在东海之滨。这不仅是浙江的故事，更是关于土地如何觉醒、乡村如何振兴、文明如何赓续的中国故事。在那片被无数次吟咏过的土地上，一个新的黄金时代正在被这代人亲手创造出来。

（作者为浙江文学馆馆长）

南湖谈艺录

主办：嘉兴日报江南周末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清明扫墓

我留下这段文字，纪念我从前疏忽了的亲人。

■俞建平

小时候，跟外婆去扫墓。长眠于地下的是我母亲家族的我从没有见过面的外公和我母亲的兄弟姐妹。在上世纪的有一段时期里，扫墓还得偷偷摸摸去。那时候公墓也少，墓地大多零星散落在郊外，在田野边的一个个土堆上，或竹园，或树丛。

后来，我跟着母亲去扫墓，九泉之下多了一位我最亲的外婆。

再后来，轮到我上前走在头里了。我偶尔会向儿孙们讲述亲人的亲情和我的思念，不知他们记住了没有。

我的扫墓分成了两个方向，一个是母系，一个是父系。

我从小跟外婆生活，所以我跟外婆亲。而爷爷只是一个概念，我不记得我与爷爷是否同桌吃过饭，想不出爷爷对我的好或不好。

在我小的时候，爷爷住在解放路一幢破旧的老宅里，有三楼三底，还有客厅和厢房，他与我叔叔、姑姑的五个家庭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但都分灶吃饭。里面还住着另外两户人家，记得有一家的男主人叫奇官。奇官他们是被房管部门安排进来的无房户，相处时间久了，也成为了好邻居，遇到我们东家兄弟姐妹之间有口角时，他们还出来做老娘舅呢。

爷爷是浦东川沙人，叶落归根，葬于浦东老家，后来那一带开发，成为热土，墓地动迁了三回，现在安葬在曹路镇。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有几年会随父亲去扫墓，父亲带队，他的兄弟姐妹集合同行。

从嘉兴到浦东川沙，不像现在这样方便。父辈们都是急行军，风风火火赶火车、赶轮渡、赶公交车。后来父亲去世了，叔叔和姑姑们也都老了，走不动了。

父亲对他的父亲感情深厚，父亲上过三年学，在13岁那年就随祖父去上海做学徒，养家糊口。

在他三岁那年，父亲的母亲因病去世。这以后父亲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姑妈就承担了照顾弟妹的责任，所以父亲跟他的姐姐亲。

长女如母，父亲常常提起他的姐姐，充满感恩，父亲的姐姐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也走了。至此浦东老家的上一代亲戚就没有了，而小一辈们，也逐渐疏远了。

去浦东给祖父扫墓，我是很想替父亲给我的这位姑妈上一次坟的，但是她没有与她的父母葬在一起，很遗憾。

姑妈一直生活在浦东乡下，不知为什么当初祖父把她留在老家。姑妈是个苦命人，她的丈夫在上世纪60年代末突然失踪，三天没有音讯，后来竟发现他在自家后面的一片树林里上吊了，那个年代这样的事也时有发生。

祖父在世时，姑妈每年要去嘉兴看望她的老父亲，她心心念念的娘家人。她在嘉兴做客，吃的是“百家饭”，那时候各家生活窘迫，亲戚来了，几个兄弟姐妹便轮流招待食宿。

姑妈在我家时，我都躲着她，一是陌生，二是听不懂她的浦东乡下口音，三是她显得很寒酸。父亲则与她唠家常，嘘寒问暖，走的时候偷偷塞些零花钱给她，父亲在家里没有经济大权。

每年的清明节，姑妈总是盼望着弟妹们去扫墓，就像当年照顾弟妹们那样，忙前忙后招呼大家。记得那年，当祖父的骨灰被护送到浦东时，她的眼泪刷刷不止，仿佛自己回到了父亲身边，从此她也不去嘉兴了，而是等待着兄弟姐妹来浦东扫墓。

姑妈家动迁后搬迁到浦东上川路的一个村子里。父亲告诉我，他的老家是在浦东顾路镇。2001年4月，我跟随父亲去扫墓，父亲执意要去顾路镇，寻找儿时的印迹。那时候浦东正在开发，老房子陆陆续续都动迁了，一排排动迁安置房抹平了几十年前的痕迹。在一个动迁小区，父亲说：我的家就是这里！我不相信，13岁离开这里，心心念念的老家只是心中一个情结罢了。这时候，在一幢两层楼的安置房转角处，一个坐在家门口的老妇人突然叫我父亲的乳名：三囡！那一天，父亲很激动，很高兴。

打这以后，父亲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不是没有机会，是我没有带他去，每次扫墓都是急匆匆来去。浦东开发的新面貌他都没有多看看，这成了我的遗憾。

我还知道，父亲有心愿要与他的父母亲安葬在一个墓地，但是也难两全，说不出口。

又到清明扫墓时，扫墓人会代代相传吗？我留下这段文字，纪念我从前疏忽了的亲人。

（作者为退休职工）

春挑野葱一片香

这一片野葱居然从不枯萎，无论严寒酷暑，都碧绿得紧。

■姚孝平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屋的墙角边，冒出了一丛野葱，郁郁葱葱的。不多久，野葱就蹿到了地沟里、水缸旁，蔓延连接成了一大片，风一吹，像一片草。

野葱无需栽种，遇潮发芽，不用管理，自由生长。个头比小葱还细，根茎和叶子都细细的，但很密，一棵棵紧挨着。一个葱头可生长出好几根葱叶。因为背阳，雨水也总是流淌到墙角边，这一片野葱居然从不枯萎，无论严寒酷暑，都碧绿得紧。

俗话说：“春令三鲜，野葱当先。”春天寻味时，大家不要只盯着马兰头、荠菜，野葱也是一味上好的野菜呢。野葱，又叫“薤”，古代叫“藠头”，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茎叶皆可食，做法简单，洗净后炒肉，也可拿来炒鸡蛋，还可蒸着吃，做野葱饭。中国人食用野葱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商朝的陶器残渣中，发现了硫化丙烯，是当时的人们在肉食中用野葱提鲜的最早记录。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一诗中写道：“束比青刍色，圆齐玉箸头。衰年关鬲冷，味暖并无忧。”前一句说的是野葱的颜色像青草，充满生机，形状圆润，如同玉制的筷子，象征着洁白。后一句中，“关鬲”是中医术语，指胸腹，是说杜甫吃了友人阮隐居赠送的薤之后，体内的寒气被驱散了，心中的忧愁也消失了。

可见，野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神农本草经》如此说野葱：“味辛，温。主金疮，疮败。轻身，不饥，耐老。”

家里没菜时，独居乡下的奶奶就去墙角边用镰刀割一把野葱，切细了放在打匀的鸡蛋里，摊一个鸡蛋。野葱密密麻麻散在鸡蛋里，浓郁的香气扑鼻，比放小葱更香。

野葱也能独立当菜。洗净后切成两段，放入油盐，放镬子上蒸一下。熟后，撒几粒味精，搅拌均匀即可食用。吃起来软糯清香，十分下饭。

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奶奶，对野葱有着极深的感情。奶奶不止一次地和我说过：“你爸小时候，家里穷，好不容易攒了点粮食，却寻不到菜。我就去水沟旁、河滩边挖几棵野葱，滴几滴油，烧了半锅野葱饭。香着哩！”

即使如今物质丰富了，想吃啥都有了，奶奶对野葱饭还是情有独钟。隔段时间，她就要去墙角边转一下，看哪一丛野葱最茂密，走过去，慢慢蹲下来，割下一把。回家煮上一锅野葱饭，就着一个松花蛋，连吃两顿。

野葱割了又长，长了就割，总是青旺旺的。只要不把葱头挖起，就会越来越密，把杂草的空间也挤占了。

（作者为嘉兴市作协会员）

藏在早市里的江南暖意

我总想起新市那个清晨。

■孙贤龙

〔嘉湖漫笔〕

早春三月，清晨四点半的新市古镇还未醒透。薄雾像一层潮润的轻纱，覆在沉睡的街巷上。青石板路上泛着幽幽的微光，静候天边第一缕晨晖来揭开这幅半透明的水墨长卷。

最先点破这寂静的，是扫帚划过石板的沙沙声。清洁工人已开始劳作，他们的身影在路灯下晃动，动作沉稳而熟稔。“早啊，大哥。”“早。”简单的对话落在空旷的街上，很快又被宁静吸收。他们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日复一日，在众人出门前，将夜晚的痕迹悄然拂去，他们是古镇无声的守护者，用一把扫帚维系着水乡千年流转的洁净与安宁。

新市是江南七大古镇之一，1700多年的光阴沉淀在每一块砖石里。此刻，沿街有几家的灯陆续亮了，点心铺子开了门。蒸汽携着面香、油香袅袅升起，包子、烧卖、茶糕、青团子、油墩子、大饼、油条……各种点心在蒸笼与油锅间次第登场。点心虽小，却是面皮、馅料与火候的精细合谋，是能吃进心里的暖意。无论百年老字号还是新开小店，掌柜们都披星戴月，守着这一方灶台，以手艺迎接八方晨客。这些冒着热气的窗口，点亮了古镇的清晨，也成了它跳动的脉搏。这是古镇百姓的早点，也是八方游客品味江南的一扇窗。

我们来新市蹲点调研已是第三天了。此地的羊肉闻名已久，明代《西吴枝乘》便有“新市羊肉，酥烂入味，可佐酒，可下面，乃吴中一绝”的记载。那天特意起早，便是冲着那一碗羊肉面。行至“李老大店”前，未及入门，浓油赤酱的醇厚香气已扑面而来——这是一家2018年镇上评出的银牌老店。

五点半光景，我们随几位食客进了店。一位穿皮夹克的老哥与我同桌。他话里透着家常的喜悦：女儿在湖州市里教书，每周三、五回家。那天正是周三，他吃完面便要去市场，多买些好菜。“平时简单，女儿回来得弄丰盛点。”他自然而然地同我们聊起湖州的房价，盘算着给女儿在城里安个家。一碗面的工夫，寻常百姓的牵挂与盼头便在蒸腾的热气里浮现出来。

不一会儿，小店坐了七八成人，气氛活跃起来。有人打趣邻座一位面带富态的老哥：“他可是我们新市首富！”门口一位顾客笑着接话，“首富哥”连连摆手说：“别听他瞎讲！”我索性挪到他旁边坐下。只见他从随身可乐瓶里倒出白酒，就着一碗干挑面、一块红烧羊肉，悠然自酌。我也要了份小碗的汤面和羊肉，学他样子，要了20元一瓶的酒，碰了一杯。

“首富哥”很健谈，自称做建材生意，每日清晨必来此吃面饮酒。“日子滋润，全靠政策好。”言语间是江南商贾特有的踏实与知足。旁人笑他买了车却常不开，他爽朗一笑说：“一天三顿酒，没工夫开！”

闲聊间，他忽然抬眼问我：“你们是来蹲点的吧？”我一愣。他解释道，近日镇上抓文明典范，听说有领导来蹲点调研，“我一瞧店里来了几张生面孔，就猜着了。”

既然被识破，我便顺势问起镇上百姓可有烦心事。他沉吟片刻，还真有一桩。早些年按规划建的标准厂房，疫情以来空关了好几年。“以前每平方米能租十七八元，一年进账近百万元。现在难喽！”他摇了摇头，将杯中残酒一饮而尽。我记下厂房地址，说一定会去看看。

走出面馆，晨光已洒满大街。腹中沉甸甸的，不知是清晨饱食羊肉的不习惯，还是“首富哥”那席话带来的沉沉思量。唯有脚下清洁工人扫出的石板路，在晨光里显得格外清爽、踏实。

“首富哥”那句“难喽”总在耳边回响。上午按计划走访企业后，我们特意去看了那片厂房。只见齐整的钢构建筑静静矗立，有的属于当年“腾笼换鸟”的民企，有的则是国资为招商而建。如何让它们重新呼吸？调研结束后，我们向当地提出了盘活建议。德清县反应迅速，专题研究，出台了衔接小微企业升级与安全整改的政策。当年下半年回访时，情况已见起色，有的厂房里又传出了机器的轰鸣声。这次整理这篇小文，又过去三年了，不知后来情况如何。但愿那位“首富哥”，早酒饮得更酣畅。

我总想起新市那个清晨。晨市散去了，烟火气却渗进了青石板缝里。古镇的一天，便由这些微小而坚实的场景铺陈开来——扫净的街道、热腾腾的点心、碗里的家常、酒后的真言，以及那最终被看见、被关照的闲置厂房。它们共同构成了新市清晨的光，平凡、温暖，照亮着生活本来的纹理。

（作者为公务员）